

# 日本近代政治思想中 之民主與國族主義<sup>\*</sup>

邵軒磊<sup>\*\*</sup>

收稿日期：2015 年 2 月 9 日

接受日期：2015 年 5 月 28 日

---

<sup>\*</sup> DOI:10.6164/JNDS.14-2.1。本研究由科技部計畫「知識史中的亞洲與中國：以亞洲經濟研究所之學術系譜為例（102-2410-H-003-064-MY2）經費資助，特此感謝。

<sup>\*\*</sup> 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助理教授，E-mail: hlshao@ntnu.edu.tw。

## 摘 要

「民主與國族主義」常被視為用以理解現代政治變遷與國家發展模式；然而上述概念在東亞世界歷史發展，具有相當特殊性。本文試圖以日本為例，討論日本現代化初期政治思想家，詮釋民主與國族主義之不同思維，列舉出數種理論模式。本文試圖闡述其主要特色為：其一、「東亞民主」實為學習西方思想之產物，其目的為加強「國族認同」，兩者具有共生關係。其二、東亞國族主義起因於救亡圖存。日本在近代化初期，一方面效法西洋民主，二方面亦恐懼甚至試圖排除西洋，因此日本政治思想家亦在「民主／國族」兩者觀念間之取捨。第三、另一個影響日本思潮之條件為中日關係，兩者呈現反差；足見，「東／西文明」與「中／日文明」之交互作用，亦體現在日本思想之中。本文試圖介紹並比較近現代初期之日本政治思想，提供學者研究東亞政治理論之切入點，以為當前發展研究究東亞思想之補遺。

關鍵字：日本帝國、政治思想、民主、東亞、國族主義

## 壹、研究背景

「民主」觀念隨時空變遷而有不同含意。西方古典民主理論家，如洛克、孟德斯鳩、盧梭之規範性理論中，強調諸如：理性選擇、保障基本人權、統治需要被統治者之同意等基本價值。二戰後，以道爾（R. Dahl）為代表之多元民主論，主要根據公民之「偏好加總」，做為代議政治決策之正當性（李柏光、林猛〔譯〕，1999）。到近期有提倡審議民主論者，強調公民之「審議能力、機會或權利」，主張公民參與方為政權正當性之來源（郭秋永，2007：64）。換言之由於社會變遷，其民主實踐與民主價值也多有不同，「民主理論」本身內容也隨之演變。此外，在不同文化實踐民主亦有多種不同方式（張佑宗，2009；朱雲漢，2004；吳親恩，2009；石之瑜，2001b）。因此，「民主」是否是普世價值（universal value），至今仍是學界討論主題之一。

隨全球化時代來臨，亞洲各國在國際政治上角色之演變，在國際學界討論「東亞民主」觀念（East Asian Democracies）亦有相當論著。如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Yan-Han Chu *et al.*, 2008) 一書即認為東亞民主具有「儒家」等文化特色。學者亦用「東亞民主」一詞，描述臺灣民主之在地實踐方式，比如強調對政治人物之「信任」（王中天、陳欽春，2014：1），或經濟滿意度是民眾對政治支持之主要指標（吳親恩，2009：1）。而在理論思辯層次上，「東亞民主」一詞也經常做為「西方民主」之對照觀念，有學者提倡東亞民主不能單純迎合西方價值（朱雲漢，2007：258）；或認為東亞民主能帶來和平（顏厥安，2005：83）；或認為臺灣對民主之思考尚為發展國家模式（瞿宛文，2011：285）。綜上述文獻回顧可知，對臺灣當地民主理論與實踐，學界已從普遍性理論、批判理論、經濟發展、田野調查、

選舉研究等研究途徑，對此加以解析。

本文立基於上述研究，將「民主」追溯至東亞近現代之廣域框架下，討論當時東亞如何接受當時之「民主」觀念，並成為其政治文化之一部份，用以補遺「東亞民主理論」之歷史途徑。尤其對臺灣民主而言，此一基礎與至今之憲政實踐，具有連續性，業經研究論文證實（王泰升，2004：167）。類似的途徑，討論中華世界的「民主」觀念受容，已有考據清末民主思想的研究（許雅棠，2012：5），以及關於民國時期之民主與國家發展之回顧（瞿宛文，2011）。對華人民主路徑之研究，在華文世界相當充實。因此，本文試圖從當時東亞另一文化來源「日本」，來探求何謂「東亞式民主」。

本文提出，東亞式民主必須結合 20 世紀初之「殖民／反殖民」風潮，對東亞各國而言即為「民族主義」之思考。就客觀因素而言，民族指有共同「文字、語言、文化、宗教、血緣、習慣」等先天性因素，而聚集的一種排他性群體（蕭高彥，1997；左正東，2011；石之瑜，2001a；沈松橋，2002；胡婉庭，2012）。而就主觀性而言，民族即為「想像的共同體」，由主觀認同結合而成（吳叡人〔譯〕，2010）。當時東亞諸國多以民族主義為號召，建立單一民族為主體的「民族國家」，從而有在國際上爭取「國權」之效用。

無庸置疑，對當時東亞社會而言，民主與民族主義都是當時引進的外來產物，必然需要與「當時」之國情調和。近代化東亞國家發展過程中，多存在有「國權／民權」之拮抗（Germaine Hoston, 1987；張學鋒〔譯〕，1998：234）。政府不斷以民族主義動員人民，向外爭取國權；人民以民主化要求限制政府，爭取民權。此即為東亞民族主義的「二重性」，與西方自下而上的民權途徑，大異其趣。以民國為例，包括關於國家建設之救國論，與更大框架之民族主義救亡論構成。日本政治思想中，雖亦有前述「二重性」，較無如當時民國之強烈生存需要，民主（關於參政、國會、立憲等等）較為傾向設法證明

自身為「文明國家」，從而擺脫外國領事裁判權，因此在日本，「民主（立憲、開設議會）」與「中央集權（富國強兵）」之主張，乃同時發生（李冬君〔譯〕，2005：8）。

由此，本文研究東亞民主議題出發，試圖以日本近代政治思想之國/民關係出發，尤其關注於國族主義之面向，又分對西方之「東/西關係」、或同為東方國族之中國之「中/日關係」的討論，將以多位日本政治思想代表者，其「民主/國族」的觀點與辯證關係，從而詮釋東亞政治理論之發展路徑。為表述便利，除特指專有名詞或文脈中指涉「民族」以外，本文總稱為「國族或國族主義」。

## 貳、近代日本政治思想之形成背景

「日本人是一個整體」之觀念，必須源自於與外國人互相往來之過程，包括 7 世紀與漢文明，16 世紀開始與基督教文明的接觸。經過多年之海禁，近代自 1854 年開港後，日本庶民間才得外國人廣泛接觸。此際，由於外表語言等天然差異，使得逐漸產生出「日本人」之獨特社群意識（Thomas Burkman, 2007）。隨著東亞國家進入世界貿易體系，西方要求東亞國家開放市場，帶來更多生活水準提高之產品；也展現軍事上之優越，使得東亞諸國無法抵抗。此即近代東西接觸時，東方對西方存在「羨慕/恐懼」之兩面性。

因此，初期日本帝國政府的外交是以廢除不平等條約（關稅自主、治外法權）為核心。當時稱為西化式「鹿鳴館外交」，試圖證成日本也是文明國家之一員，並制訂法律憲法、現代審判制度、實行議會制（木村時夫，1981）。與此相對，當時政治菁英之更需要堅守其傳統政治意識「水戶學」，提出一君萬民論。所以其制訂之明治憲法（1889），以君主立憲方式「同時實踐」民主化與現代化，也就是本文所稱「國/民關係」之共生，成為東亞民主化的特色。

日本國族主義的另一個延長，就是日本必須對原有之周邊國際秩序（朝貢秩序），也就是重新處理中國觀。典型之研究討論，主要可分為「中國蔑視觀點」（吳懷中，1999：89-105）、「脫華夷秩序觀點」（孫歌，2010：125）以及「日本建設東亞觀點」（劉嶽兵，2010）。上述文獻多以福澤諭吉之脫亞論為核心。近期也有論文介紹了大隈重信、內村鑑三、北一輝、內田良平等日本重要思想家的中國觀，觀點較為全面性。（張學鋒〔譯〕，1998）以及陳鵬仁研究日本對中國不干涉政策之形成時，也提及作為背景之「日本知識份子對中國之認識」，也提及了內藤湖南、矢野仁一、石橋湛山（1986：3-4）等學者。本文希望指出，當時中國也正在以同樣路徑，實踐「民主」，其國族主義與民主的辯證關係，此為前述論文已有說明，茲不贅述（瞿宛文，2011；許雅棠，2012）。

也因此，本文試圖歸納，東亞特色之「國族主義為前提的民主」，依其思辯模式，表現為四種不同形式：「民主／國族主義同根並生；國族主義至上、民主工具論；民主／國族主義相互轉化論；由民主主義用以超越國族主義」，以下分別介紹其代表之思想家，福澤諭吉、內田良平、北一輝、吉野作造四個思想家之理論。

## 參、福澤諭吉之民主與國族主義

說到日本近代政治思想的發端，往往以福澤諭吉（1835-1901）做為代表。如前述，福澤諭吉面對當時日本被外國侵略甚至殖民的危險，對於當時西方之基督教文明，帶有明顯的敵意。福澤認為自己之首要任務，是喚醒國民，提倡「國民的共有歷史記憶」，強調「萬世一系」等日本特殊性。而代議政體論與議會制度，亦為將日本特殊性植入人心之工具，這是典型「民主／國族」共生的思維。

其次，福澤也必須處理對傳統「東方」觀念的問題。福澤認為對

當時中國文明而言，日本文明更有機會向前邁進。在其思想體系代表作「文明論之概略」（1875）中，便是以西洋文明為頂點，採用單向式的發展軌跡，福澤斷定「日本比中國要更容易接受西洋文明」（福澤諭吉，1970a：25-26）。在 1881 年的《時事小言》一書中，福澤指出東洋諸國（波斯、暹羅、支那、朝鮮、日本）雖互相風俗不同，但相對於西洋諸國，東西更有巨大差異（福澤諭吉，1970c：201-202）。因此，日本應當東洋諸國之文明「中心」，成為西洋列強的一員，再帶領東方諸國。在此一階段，福澤認為日中還具有一體連帶「兄弟之邦」的共性（福澤諭吉，1971：479-481）。但在甲申事變（1885）之後，福澤稱中韓為惡友：「不可期待鄰國之開明，不如脫離（亞洲）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福澤諭吉，1970d：260）。本文認為，「脫亞論」相當能體現日本文明在「中國文明／西洋文明」中擺盪的基本架構，在日本帝國政治思想家的心中，中國與日本代表兩個端點，日本只能選擇其一。在當時中日西化競賽的背景下，中日雙方自然生出敵對意識，因為中華文明若是也能夠「西化」，日本文明就失去參照國族主義之基準。因此，甲午戰爭被福澤比擬為「代表新文明的小國與代表舊文明的大國」的對抗（福澤諭吉，1970b：491）。

因此，福澤身上關心的終究是日本民族之進步。在明治時期，日本面臨「西化／殖民」兩種議題，而在文明論層次上，西化即為避免被殖民方式之一。最後福澤說服了伊藤博文等之維新派，採用君主立憲之方式，天皇與民選國會共存。當時主要之理由即為調和君權與民權（鍾淑敏〔譯〕，2008）即為民主是用憲政與議會統合國家，使國家一元化。本文認為，恰巧在福澤的身上，體現了東亞特色之「國權與民權不能截然分立」的思考邏輯。如福澤之名言「一身獨立到一國獨立」，易言之，對福澤而言，一身獨立（自由主義，文明化）是用來作為一國獨立（不被殖民）之基礎。

但從日俄戰爭後，日本民族主義到達頂底點，但是最後日本藉此

戰爭獲益甚少，甚至造成民眾不滿，爆發「日比谷事件」。因此，日本朝野遂對歐化感到失敗，認為自己終究無法「融入歐洲」。日本社會又重新關注東亞局勢，重新回到亞洲，因此以 1911 辛亥革命為例：執政者支援清廷，在野者支持革命派，雙方都試圖帶著某些想法進入中國（陳鵬仁〔譯〕，1986：1）。當時主要之各種思潮，也多轉向評論甚至參與當時中國大陸之局勢。如後節將要討論之內田良平、吉野作造、北一輝等。辛亥革命後，中華文明亦面臨同樣轉變，因此「新生之中國」提供日本整體社會重新思維日中關係的機會，強烈了衝擊了日本政治思想的深處。

## 肆、內田良平之民主與國族主義

國權論另一典型，就是當時右翼團體之思潮，以黑龍會之內田良平（1874-1937）為代表。內田認為當時中國之社會分為「菁英社會、農工商社會、遊民社會」（內田良平，1937）。菁英社會，也就是儒士構成的社會階級，可經由科舉方法成為官吏，屬於統治者階級；相對於此的農工商社會則主要關注個人利益，屬於被統治階級。兩者具有階級矛盾，其中「遊民社會」則為不穩定之力量，若與菁英社會聯合，則壓制農工商社會；若與農工商社會聯合，則造成動盪。內田認為，此即中國歷史「一治一亂」之邏輯。因此內田建議，應當善用不同方式，分別對付三種階級（威嚇、高壓、利誘等）。內田在此延長線上主張「共和」，但終究就是實踐皇道國際秩序之「工具」，鼓勵日本操縱中國、滿洲、韓國（社說，1992），甚至有以日本人統治取代漢人中國的思維（張啓雄，1995）。簡言之，內田雖帶有「東洋連帶論」的表象，但其「民主（共和）論」僅為工具，多認為內田代表了日本侵略膨脹主義的最右翼觀點。

從思想根源來看，內田與福澤前期思維類似，認為日本有保衛東



亞之責任；之後，由於時代推演與當時國際情勢，這種保衛東亞的思維，轉變為積極日本國權與現實主義。內田之思想就是將福澤原來的「東亞文明」投射到整體叫做「東亞區域」，以傳統儒家式等差秩序為核心思維，以日本國權為核心的東亞地緣政治觀，在內田思想中體現了東亞特色，於兩個部分：其一、其東亞政治秩序必須遵從傳統東亞文明（儒家）國際秩序；其二、東亞政治還是必須排除非東亞文明成員（俄羅斯與西方諸國）。總言之，內田將日本國族主義視為至上，將「民主」視為工具，是國權政治思想之代表。其認為無須朝向西方文明親近，但也必須將東方文明（中國、韓國、滿洲）等「綁定」在日本控制範圍當中，這種典型之右翼觀念，即為日本相當特殊之「亞洲觀」。

## 伍、吉野作造之民主與國族主義

與內田完全相反，吉野作造（1878-1933）的民本主義，雖有經歷若干思想轉向，但一般被通念為日本民主理論的代表（黃自進，1991；黃自進，1992；黃自進，1993）。本文試圖在其研究基礎之上，加以闡述其政治哲學。吉野身處日本之大正民主期（1912~1926），政黨政治與內閣輪替皆步入制度化階段。因此，吉野所主張之民本主義，如「論憲政本意及其貫徹之途徑」等文獻，致力於國家機構之制度化，是大正時期之代表性之社會思想。吉野本身也參與政黨、次級政治團體、中日政治交流等活動，親身實踐為自身學說（黃自進，1993：527）。

就思想脈絡而言，吉野曾受基督教文化影響，也曾潛心研究黑格爾哲學，認為理性之辯證過程，會使各種不同差異朝向而最高理性（完美）。因此，每一個歷史個體，雖有差異，但最終會向「普遍性」邁進。因此，世界具有歷史進步之路徑。人民藉由實踐代議政治，能提

升自身，能使人格成長，最終得到最善之政治狀態。唯若盲目陷入示威暴動，則有「眾愚」之嫌，因此吉野主張必須有哲人調和理論與實踐，善加引導，使其正向成長（李永熾，1979：191-210）。其主要之方式，便是建立憲政法制。吉野認為民本憲政，方能超越國權主義，也能牽制當時政治派閥之貪婪專權。

另一方面，吉野亦有長期在中國之經歷。因此，如 1919 年五四運動時，吉野身為日本人支持排日運動（張學鋒〔譯〕，1998：67-80；石之瑜、李靜旻，2007：16），吉野發表社論，呼籲應當分別看待「侵略的日本／和平的日本」，所以對吉野而言，真正敵人是日本的官僚、軍閥，而非中國人民。並且吉野本人頗為同情中國排日運動。他在此篇社論發表之後，也不斷提倡「日中學生提攜運動」，也與北京大學的左派知識份子李大釗（1888-1927）互相呼應。同一論理，吉野也對日本當時鎮壓「朝鮮獨立運動」之舉，感到痛心（陳鵬仁〔譯〕，1986：1）。

對從民本主義出發的吉野而言，日中有同樣價值與發展路線，應當互相提攜，強調民主化能協助日本調和歐美關係，也認為中日最終可以跨越國界互相友好。吉野試圖將「民主」昇華為歷史發展「普遍性」，認為東亞國家最終必須直接面對民眾的力量，開放民眾參與權力，共同朝向「民主」普世價值。

## 陸、北一輝之民主與國族主義

以往研究者多半視北一輝（1883-1937）為日本法西斯主義思想的源流，又稱「日本超國家主義之理論」（周啓乾〔譯〕，1990：23-26；王屏，2004：168-186；石之瑜、李靜旻，2007：16）。其代表作《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其第一條即明言：「停止實行憲法。」（北一輝，1923）因此，常被認為反對憲政，主張右翼思想代表。但較諸前述內

田之天然日本中心國族觀，北一輝視國族主義為「普世價值」，稱為國魂，乃是當時北一輝對於歐洲殖民侵略的情感反彈。

換言之，北一輝試圖使用更高的普世價值來否定「西方單一」發展路徑，融合了民主與國族主義，提出了一種普世價值秩序，能夠越體現其價值的政體，就在歷史路徑上越超前。在政治思想上，有其創見。因此在這個指標中，中國有可能超越日本，東方也有可能超越西方。以其自身之回憶錄《支那革命外史》為例（北一輝，1941：35），中日兩方在北一輝的眼中，已非因東亞文明而具有連帶感，而是藉由共同的振興國魂發展過程中，相互提攜。日本所擁有的經驗，能提供中國學習。

因此，依北之理解出發，中國的排日運動是由於中國民族主義覺醒所引起之愛國心，這點是因為北一輝曾參與中國革命，認同中國民族主義。<sup>1</sup> 然而，國族主義終究必須回到自身國族，中日國族間之衝突，成為北一輝之思想體系中的難結。因此北一輝後期著作，撰寫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綱》一書（北一輝，1923），轉而認為日本必須寄望於「下層階級」發動革命，自我改造。在 1920 年代末，世界經濟恐慌，同時日本經濟政策應對失敗，造成農村凋零，社會不滿。此時，北一輝之著作成為少壯軍人發動二二六事件（1936）之理論基礎。其思想來自著作有《國體論以及純正社會主義》之中，更是具有當時日本本土所忌諱之重視平等之「社會主義」色彩（北輝次郎，1908）。其理論最後為如坂野潤治所評論具有民權色彩的社會主義。<sup>2</sup> 對北一輝而言，可謂其將「民權／國族」是達到辯證統一，在不挑戰天皇制架構下，試圖結合一君萬民式國家社會主義，此一思想也成為昭和時

<sup>1</sup> 關於北一輝從事辛亥革命的細節，請參閱（黃自進，2001；黃自進，2000；黃自進，1999：73-104）

<sup>2</sup> 如坂野潤治（著），鍾淑敏（譯）（2008）。《近代日本政治史》。臺北：五南書局。其書的觀點中，就對認為北一輝更有「社會主義性格」。

期少壯軍人的主要思想根據。

## 柒、「東亞特色」的民主與民族主義

以政治學之思考脈絡，極端的國族主義可能走向較為封閉獨裁的政體，而民主則是較為開放的政體，因此，常認為民主和國族主義呈現「對立」，此消彼長。但是，在日本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知識份子必須同時處理對外抗拒列強殖民，對內統合打破原來封建規則，從上到下進行權力滲透的歷程中。知識份子對於「民主／國族」的想像出現不同觀點，可說東亞民主實踐時，政治理論必須同時處理兩層次之意義。因此，在東亞近代化初期，對民主理論之多元想像，值得深思。綜上推論，本文製表如下：

表 1 日本政治思想之東亞民主與國族主義比較

|       | 福澤諭吉                           | 內田良平                  | 吉野作造                               | 北一輝                                |
|-------|--------------------------------|-----------------------|------------------------------------|------------------------------------|
| 對民主觀點 | 民主是用憲政與議會統合國家，使國家一元化。          | 民主僅做為統治方法，是維護日本國權之工具。 | 天然理性造成民主主義之普遍性，可以無限發展。             | 應當以亞洲主義超越民族主義，賦予全員民主，保障民權。         |
| 對國族觀點 | 日本民族主體之初期型態以「脫亞入歐、文明開化」確立自身定位。 | 日本民族優越，蔑視漢民族，排斥西方民族。  | 統治者需融入群眾、指導群眾、關愛群眾。日本可先於任何民族之「潮流」。 | 國族主義做為普世價值，但最終目的為轉化成國家社會主義形式之民主實踐。 |
| 分類    | 民主/國族主義同根並生。                   | 國族主義至上論。              | 由民主主義超越國族主義。                       | 民主/國族主義相互轉化論。                      |

資料來源：由作者自製

如上可見，在日本政治思想中，「民主／國族主義」問題，表現為共生、轉化或超越等不同模式。福澤諭吉最初以文明論為基礎，東亞文明確實具有共性與特殊性，如《民情一新》中讚美民主政治，但也在《時事小言》中主張對外強硬的民族主義色彩。內田良平主張日本民族優越論，無用置疑是國族主義者，但對革命黨之支援，卻促使東亞民主政治的發展。吉野作造是相當的矛盾體，以民本主義者聞名，卻也不反對天皇制。北一輝是另一個矛盾體，極端國族主義的情結下，反而超越了國家主義，主張「純正社會主義」，也催生出民主化與民權之可能性。上述理論，「民主／國族主義同根並生；國族主義至上論；民主／國族主義相互轉化論；由民主主義超越國族主義。」都是當時因應東亞局勢而生，具有東亞特色。本文認為東亞的民主／民族主義實踐，兩者都是擬制的想像產物，一種是用來對外說明文明性格，一種是用來對內統攝民族，在東亞特色的實踐當中，常並行不悖相互轉化；民族主義常成為民主化之政治動員力量，反之亦然。此一結論提供學界與西方不同之參照點，用以研究東亞思維之民主理論。

後續日本歷史發展中，上述多元性急遽消失。當時日本「國族」意識，在後來的對中、對美戰爭中，失去社會言論自由，日本知識份子的多元性消失，多數放棄自己立場，思想轉向而趨向贊成單一之日本神國論。至此，東亞國族主義完全壓過民主主義，也在二戰戰爭期間推向其他東亞國家。日本國族主義激化了其他東亞國族主義，其東亞國家主體性雛形多在二戰中建立（竹內好，1965：50-51）。國族主義的思維，亦成為戰後東亞民主理論的重要思維基礎。此間亦有相當優秀之日本政治思想家，如岡倉天心、內村鑑一、尾崎秀實、橘樸、中江兆民、內藤湖南等，限於篇幅，本文目前無法全數處理。

綜上所述，本文試圖在三方面做出整理，提出「東亞特色的民主／國族主義發展」之各種模式，以與西方理論對照。其一、「東亞民主」實為學習西方思想之產物，其目的為加強「國族認同」，兩者具

有共生關係。其二、東亞國族主義起因於救亡圖存。日本一方面效法西洋民主，二方面亦恐懼甚至排除西洋，因此日本政治思想家亦在「民主／國族」兩者之猶豫不決。第三、另一個影響日本思潮之條件為中日關係，日本國族主義思想也必然要處理「中國為何」之問題。足見，「東／西文明」與「中／日文明」之交互作用，亦體現在日本思想家重心中。本文試圖介紹並比較近現代初期之日本政治思想，試圖建立較為橫向之結構視角介紹並比較近現代初期之日本政治思想，提供學者理解日本帝國時期之政治思想基礎，期許提供學者研究東亞政治理論之切入點，以為當前發展研究究東亞思想之補遺。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部分

- 王中天、陳欽春（2014）。〈影響台灣民眾對現任總統信任度的因素探討〉，《臺灣民主季刊》2(11): 1-38。
- 王屏（2004）。《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
- 王泰升（2004）。〈自由民主憲政在臺灣的實現：一個歷史的巧合〉，《臺灣史研究》11(1): 167-224。
- 左正東（2011）。〈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典範問題與經濟民族主義的再檢視〉，《國際關係學報》32: 51-90。
- 石之瑜（2001a）。〈民族、民族研究、民族主義：兼論作為意識形態的社會科學研究〉，《問題與研究》40(4): 97-110。
- 石之瑜（2001b）。〈鑿開霸權：普世主義與相對主義之外關於民主的知識〉，《中國大陸研究》44(3): 1-15。
- 石之瑜、李靜旻（2007）。〈斷代與斷裂——日本近代中國認識的基礎脈絡〉，《中國大陸研究》50(1): 16-40。
- 朱雲漢（2004）。〈臺灣民主發展的困境與挑戰〉，《臺灣民主季刊》1(1): 143-162。
- 朱雲漢（2007）。〈東亞民主困境與當代思維陷阱〉，《臺灣社會研究》65: 257-263。
- 吳叡人（譯）（2010），Benedict Anderson 班納迪克·安德森（原著）。《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臺北：時報出版。
- 吳親恩（2009）。〈經濟議題與民主體制評價－東亞國家的觀察〉，《臺灣民主季刊》6(1): 1-39。
- 吳懷中（1999）。〈文明史觀在近代日本對華認識及關係中的影

- 響——從思想史與國際關係的接點出發》，《日本學刊》1999(1): 89-105。
- 李冬君（譯）（2005），松本三之介（原著）。《國權與民權的變奏—日本明治精神結構》。北京：東方出版社。
- 李永熾（1979）。〈吉野作造的民本思想〉，《臺大歷史學報》6：191-210。
- 李柏光、林猛（譯），Robert A. Dahl.（原著）（1999）。《論民主》。臺北：聯經出版社。
- 沈松橋（2002）。〈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3: 49-119。
- 周啓乾（譯），信夫清三郎（原著）（1990）。《日本近代政治史第四卷：走向大東亞戰爭的道路》。臺北：桂冠。
- 胡婉庭（2012）。〈近代中國「民族主義」一詞的興起與演變—以 1901 至 1935 年爲限〉，《東亞觀念史集刊》2: 219-260。
- 孫歌（2010）。《把握進入歷史的瞬間》。臺北：巨流。
- 張佑宗（2009）。〈選舉輸家與民主鞏固—台灣 2004 年總統選舉落選陣營對民主的態度〉，《臺灣民主季刊》6(1): 41-72。
- 張啓雄（1995）。〈近代日本「爭天下」的構想與佈局——從擬定「清國征討策案」到發動甲午戰爭〉，《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53-77。
- 張學鋒（譯），野村浩一（原著）（1998）。《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走向亞洲的航蹤》。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許雅棠（2012）。〈如何觀看自由民主？源自儒家思想傳統的一種觀看之道—從清末學人談起〉，《臺灣民主季刊》9(3): 1-35。
- 郭秋永（2007）。〈多元民主理論—公民審議的一個理論基礎〉，《臺灣民主季刊》4(3): 63-107。
- 陳鵬仁（譯），臼井勝美（著）（1986）。《近代日本外交與中國》。



- 臺北：水牛出版社。
- 黃自進（1991）。〈吉野作造對中國革命的認識與態度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 237-257。
- 黃自進（1992）。〈吉野作造對孫中山的認識與評價〉，《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1: 599-619。
- 黃自進（1993）。〈吉野作造在五四時期的對華文化交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2(上): 505-529。
- 黃自進（2001）。《北一輝的革命情結：在中日兩國從事革命的歷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劉嶽兵（2010）。〈近代日本中國認識的原型及其變化機制〉，《歷史研究》2010(6)。
- 蕭高彥（1997）。〈國家認同、民族主義與憲政民主：當代政治哲學的發展與反思〉，《臺灣社會研究》26: 1-27。
- 鍾淑敏（譯），坂野潤治（〔原著〕），鍾淑敏〔譯〕（2008）。《近代日本政治史》。臺北：五南書局。
- 瞿宛文（2011）。〈民主化與經濟發展－台灣發展型國家的不成功轉型〉，《臺灣社會研究》84: 243 -288。
- 顏厥安（2005）。〈和平與強權政治：由歷史哲學反省東亞的民主與和平前景〉，《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15: 49-88。

## 二、日文部分

- 內田良平（1937）。《支那觀・国難来》。東京：若林半。
- 木村時夫（1981）。〈日本における条約改正の経緯〉，《早稲田人文社会科学部》19: 1-18。
- 北一輝（1923）。《日本改造法案大綱》。東京：改造社。
- 北一輝（1941）。《支那革命外史》。東京：聖紀書房。
- 北輝次郎（1908）。《国体論及び純正社会主義》。新潟：自費出

版。

竹內好（1965）。《現代中国論》。東京：勁草書房。

社説（1992）。〈世界の大勢を論じて我國策樹立の急務に及ぶ〉。

内田良平文書研究會編，《黑龍會關係資料集（第4卷）》。

東京：柏書房。

黃自進（1999）。〈北一輝と辛亥革命：支那革命外史の位置づけの再検討〉。小島朋之、家近亮子編，《歴史の中の中国政治：近代と現代》，頁 73-104。東京：勁草書房。

黃自進（2000）。〈北一輝與中國革命〉。衛藤藩吉、山田辰雄編，《共生から敵対へ—第4回日中関係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論文集》，頁 169-197。東京：東方書店。

福沢諭吉（1970a）。〈文明論之概略〉，慶應義塾編《福沢諭吉全集第4巻》。東京：岩波書店。頁 1-212。

福沢諭吉（1970b）。〈日清の戦争は文野の戦争なり〉。福沢諭吉（著），慶應義塾（編集），《福沢諭吉全集第14巻》。東京：岩波書店。頁 491。

福沢諭吉（1970c）。〈時事小言〉。福沢諭吉（著），慶應義塾（編集），《福沢諭吉全集第5巻》。東京：岩波書店。頁 95-232。

福沢諭吉（1970d）。〈脱亜論〉。福沢諭吉（著），慶應義塾（編集），《福沢諭吉全集第10巻》。東京：岩波書店。頁 238-239。

福沢諭吉（1971）。〈支那の改革に就て〉。福沢諭吉（著），慶應義塾（編集），《福沢諭吉全集第16巻》。東京：岩波書店。頁 478-482。

### 三、英文部分

Burkman, Thomas W. (2007). *Japan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Chu, Yan-Han, Diamond, Larry, Nathan, Andrew J. and Shin, Doh Chull. (2008).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oston, G. (1987). *The State, Identity,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China and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ger, Bowen, W. (1980). *Rebellion and Democracy in Meiji Japan*.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emocracy and Nationalism in the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of Imperial Japan\*

*Shao Hsuanlei\*\**

## Abstract

Theories of democracy often use “democracy and nationalism” to understand modern political change and pattern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However,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 these ideas are quite unusual.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Japanese political theorists in the early democratization period interpreted the concepts of democracy and nationalism, identifying several theoretical strains and showing how while nationalism and democracy developed at the same time in Japan, Japanese political thinkers had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ncept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laborate on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cracy and nationalism. First, “East Asian democracy” is a product of studying Western thought. Its objective is strengthening national identity, implying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cracy and nationalism. Second, East Asian nationalism originated from a struggle for national survival.

---

\* Any questions or discuss are welcomed. SHAO Hsuanlei, E-mail:hlshao@ntnu.edu.tw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t. of East Asia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jor: Sino-Japan Relations, China studies, Modern Japanese History.

While on one hand Japan imitated Western democracy, on the other hand it viewed the West with fear and even hostility. This paradox caused Japanese political theorists to waver between democracy and nationalism. Third, another factor which influenced Japanese thought wa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he dialectical interaction of Eastern/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of Chinese/Japanese civilization is evident in the focus of Japanese political thought. This study attempts to introduce and compare early-modern Japanese political thought in order to provide a new angle for research on East Asian political theory.

Keywords: democracy, East Asia, Japanese Empire, nationalism, political ideology

